

外贸成绩单有两个“没想到”

每周经济观察

上半年外贸有两个“没想到”：一是全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能连续13个月保持同比正增长，而且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最好水平；二是山西省外贸增速最快，进出口同比增速高达108.4%。外贸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我国外贸发展长期向好的大趋势没有变，相信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没想到”。

最吃紧的时候，海关、商务等部门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在严格落实防疫要求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我国与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之间建立起“快捷通道”，确保跨国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畅通。

类似这样的政策举措，贯穿于去年以来我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各个时期，特别是疫情防控步入常态化阶段后，相关宏观政策不搞“急转弯”，继续保持了连续性、协同性，为广大外贸企业抢抓市场机遇提供了有力支撑。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外贸能连续13个月保持正增长且规模创新高，是有其必然性的。

同样，作为外贸“黑马”的山西，其进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也绝非一夜之间就形成的。从山西近些年经济数据分析看，曾经“一煤独大”的山西经济已逐步摆脱了对煤炭的依赖，产业结构也从过去卖资源为主转向加工贸易、服务贸易等。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内陆省份的山西，正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跳出内陆谋发展。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山西已与“一带一路”相关63个国家开展经贸交流，对上述国家和地区实现货物贸易超260.9亿元，同比增长107.5%；此外，山西还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贸易伙伴货物贸易进出口

365.4亿元，同比增长134.5%。

不只是山西，在上半年外贸同比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8个省份中，中西部地区就占据了12个席位，这表明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基础上，正不断与当地特色产业、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比较优势。此举将有助于促进外贸布局更趋协调，激发更多外贸潜力。

外贸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外贸上半年“成绩单”表明，中国的扩大开放并没有因疫情止步，更不会因此而倒退，相反更进一步坚定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下半年，我国外贸面对的形势依然复杂多变，特别是全球疫情仍在蔓延、主要经济体复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有所加大等不利因素，仍将对外贸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但我国外贸发展长期向好的大趋势没有变，再加上其与生俱来的强大韧性，我们相信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没想到”。

原载于《经济日报》

加快构建更亲消费的体制机制

匡贤明

推动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夯实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需要建立亲消费的体制机制。

释放消费潜力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从短期看，在内外形势变化的情况下，尤其是近期一些地区受疫情的影响，短期的暑期消费有可能面临比较大的压力；从中长期看，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个关键在于激发消费潜力，推进消费升级，夯实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释放消费需求的重要性，不仅在“三驾马车”中全面凸显，更在经济增长函数中全面凸显。

从趋势看，我国释放消费潜力的条件和能力并未完全发挥。一方面，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全社会消费的规模逐步扩大。仅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例，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0万亿元；人均消费支出水平超过2万元。另一方面，消费结构持续升级的态势明显。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逐步提升，预期未来几年有可能超过50%。

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消费的升级，不仅是重要的增长指标，也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个综合衡量。应当说，过去几年我国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居民收入增长而自发形成的一个趋势，支撑消费的体制机制开始形成，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寄希望于通过扩大投资的政策和体制机制来支撑消费的增长和升级，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过去40余年，我国经济发展从较低水平起步，抓住全球化的机遇，通过构建有利于出口和投资的体制机制，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财税、金融、投资等体制机制变革，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总结过去的经验，推动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夯实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需要对过去行之有效的某些体制机制及时作出改革和优化，把过去亲出口、亲投资的体制机制转变成为亲消费的体制机制。

例如，适应非标准化、小众化、升级化的服务业特点，进一步优化投资体制，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在匹配投资与消费中的作用。尤其要发挥社会资本在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就需要加快改革并消除二、三产业间的政策差异以及相关体制安排差异。

与制造业投资相比，服务业投资更需要发挥中小微企业的作用，发挥他们在小众化、精准化投资中的作用。需要加快落实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并不断强化，加快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应推动城乡资源双向自由流动，这不仅涉及资源要素在更大空间上的优化配置，而且涉及走向共同富裕的体制保障。

从制度上发挥地方政府在促进消费中的作用。调整某些地方政府注重投资而忽视消费的倾向，把地方的消费环境建设提升到与投资环境同等重要的位置，使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从吸引投资的主体转变为促进消费的重要主体。其中，适应服务型消费需求升级的趋势，需要加快中央地方财税关系的调整，以形成公共服务导向和消费导向的财税体制。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洞见

增强城市救援救灾整体力量

——“加强城市安全工作”系列评论之三

冯奎

受到技术条件、经济成本等限制，一个城市不可能追求无限安全，更难以做到无限安全。提升专业救援力量、个人自救力量、社会救援力量，使这三种力量有效协同，形成强大的整体力量，才能让救援力量经得起灾难的考验。

受到技术条件、经济成本等限制，一个城市不可能追求无限安全，更难以做到无限安全。城市暴露于各类风险之中，易遭受各类灾害事故，因此救援救灾在所难免。增强救援救灾的力量，减少生命财产损失，尽可能短时间内恢复生产生活常态，正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救援救灾的力量越大越强，当然效果会越好。如何大、如何强？关键是要有针对性提升专业力量、个人力量、社会力量，并使这三种力量有效协同，形成强大的整体力量。

一是专业队伍的力量需要重点提升。救火队、抗洪队、防暴队、工程队、医护队等，都是救援救灾的常规性专业队伍。这些队伍的队长应是相关专业出身，协调这些专业队伍的负责人，也应熟悉城市安全工作，否则只能讲场面话，甚至指挥失误。专业队伍需要增强在现代城市救援救灾的实战能力。为此，应系统学习现代城市复杂系统的构造特征，能够借助和动用各类智能手段辅助救援救灾。此外，面临突发性城市安全事件时，社区或其他行业人员还需要有能力实现角色切换，瞬时变为专业性的救援救灾队伍。因而，有关部门应加大培训投入，推动

实现这方面能力迁移。

二是个人自救的力量亟待补足加强。自助或自救的重要性，在于公共资源抵达事故现场有时受到诸多条件限制，在专业力量到来和介入之前，个人自救(自助)具有关系生死存亡的意义。为提升自救力量，城市各类机构应在入职教育和年度培训中，增加自救知识教育培训内容；各类学校应增加自救训练。有的城市有一些易发频发安全问题的领域，应针对此类情况常态化开展自救演练。

三是社会主体的力量需要引领统筹。媒体应常态化传播城市救援救灾的技巧方法。近期，一些电视媒体和新媒体剪辑了如何在洪水中求生的各类知识短片，因针对性强，能提升市民自救技能水平，传播极其广泛，反映了这些信息的重要性。各社会组织在城市救援救灾中应积极作为，如就所在行业、地区的特定险情灾情进行重点研判，为有关部门提出预案思路；广泛开展公益、群众性活动，推动全民提升救援救灾意识。大灾大难来临之际，社会组织应以合适方式充分参与决策，展示专业化水平；加入到救援实际行动之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本系列评论完)



勾建山作(新华社发)

心理咨询乱象待治

近年来，心理咨询行业在我国迅速发展，一些心理咨询机构收费很高，但咨询师水平良莠不齐，甚至还有部分心理咨询机构提供心理咨询师培训发证服务，承诺“零门槛”“高收入”“拿证即就业”。实际上，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认证后，已经没有由政府主导的统一的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目前市场上多数心理咨询师证书的含金量大不如前。相当一部分从业者并不具备病理、心理、生理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专家提示，在选择心理咨询机构和心理咨询培训项目时，需谨慎甄别，避免上当受骗。(时 锋)

近日，浙江龙港农村商业银行正式挂牌开业。该行是从浙江苍南农村商业银行以“存续分立”方式筹备组建而成，注册资本金3.31亿元。在当前不少城商行和农商行合并重组的形势下，浙江龙港农商行走的却是一分为二、“存续分立”的路子，是我国金融改革路径的一个重要样本。

“存续分立”，也称派生分立，主要指一个公司将一部分资产或业务依法分出，成立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司的行为。原公司的债权债务可由原公司与新公司分别承担，也可按协议由原公司独立承担。新公司取得法人资格，原公司继续保留法人资格。

浙江龙港农商行的成立，表明了金融改革从来没有固定模式。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永远是金融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龙港原是温州市苍南县辖属的建制镇，在全国首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改革中，经国务院批准撤镇设市。龙港设市后，随之而来的是行政机构重组，设立当地独立的银行机构在情理之中。农商行由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来，是独立法人机构，董事会和总部往往设立在县或者市级行政区。从苍南县农商行分设一个龙港农商行，正像龙港从苍南县分设并撤镇设市一样，顺理成

金融改革没有固定模式

吕志强

章，远比另起炉灶简单易行。当然，衡量“存续分立”金融改革的成功，不在于分设成立了新法人机构，而取决于其市场定位、经营理念、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的有效实施，这也是县域金融机构必须解决的共性问题。就当前来说，首要的是将中央政治局新近部署的下半年经济工作精神落到实处。

农村金融机构要坚持“姓农姓小姓土”的市场定位和初心使命，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坚持服务“三农”，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产业，助力秋粮生产，助力稳定生猪生产等。应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推动当地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应努力缓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资金需求，支持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积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应进一步发展普惠金融，向有需求的居民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合理引导居民消费、储蓄、投资等。同时，应扎实推进数字化转型，加强精细化管理和风险控制，不断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作者系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高级经济师)

严监管利于支付行业高质量发展

陈果静

防范支付领域金融风险，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重要一环。要继续对行业监管保持高压态势，保持监管定力，清除行业乱象。要平衡好支付行业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关系，加快升级监管手段，完善监管框架，为行业发展厘清规则。

支付行业严监管仍然保持着高压态势。近期，为进一步规范非银行支付机构重大事项报告行为，提高支付市场风险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维护支付市场稳定，人民银行发布《非银行支付机构重大事项报告管理办法》，对机构用户信息保护、反洗钱等重大事项提出了明确要求。

近年来，对支付行业的严监管态势一以贯之，支付机构罚单不断，监管法规密集出台。仅在7月，就有7家支付机构收到罚单，罚没金额总计超过3500万元。从罚单事由来看，主要集中在反洗钱、收单业务等方面。在2020年，支付行业共收到约68张罚单，累计罚没金额超过3.2亿元。监管“短板”也在持续补齐。年内出台的《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征求意见稿)》《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剑指支付行业乱象，旨在进一步规范支付机构合规经营，维护支付服务市场健康

发展。强化对支付行业的监管，是支付业务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近年来我国支付行业发展速度惊人，年均保持50%以上的增长率。2020年，支付系统处理的支付业务金额达到8195万亿元，极大地便利了城乡居民日常支付，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的资金循环。

然而，伴随支付行业高速发展，行业乱象逐渐暴露。部分非银行支付机构违规经营、挪用客户备付金，更有部分机构为灰色交易提供支付手段，甚至沦为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通道”，在行业内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环境。这不但扰乱了金融秩序，集聚了金融风险，更侵害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危害，亟需强化对行业的监管，引导支付机构回归支付本源。

防范支付领域金融风险，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重要一环。接下来，支付行业严监管高压态势仍将持续。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支付业态更趋多元，对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要继续对行业监管保持高压态势，保持监管定力，清除行业乱象；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要平衡好支付行业创新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加快升级监管手段，完善监管框架，为行业发展厘清规则。对存量风险按照既定措施平稳消化，对增量风险要强化监测、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

支付机构对于当前监管态势也要有正确认识，不能错误地认为对行业的监管是“一阵风”“运动式”的，幻想整治一段时间后，监管会有所松动。需要看到，严监管是为支付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护航，将有助于整个行业走得更远、走得更稳。当前，防范和化解支付领域风险已经进入常态化阶段，严监管的态势一以贯之，对所有机构一视同仁。支付机构须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坚守合规经营底线。应从提升自身技术“含金量”入手，加快提升服务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的能力，并通过支付与技术的融合培育起参与市场发展和竞争的新优势，共同助推行业完成“由量到质”的转变，切实提升支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